

## 商品经济浪潮下明末“髻髻”的嬗变

洪安娜<sup>1</sup>, 张竞琼<sup>2</sup>

(江南大学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髻髻”是明代已婚妇女的必戴头饰,亦是搭配正装的首服。明初,“髻髻”具有规范社会身份的“礼”制意义。至明朝中后期,“心学”思想的盛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以及审美时尚的流行,促使“髻髻”由最初的“礼”制象征演变为炫富的工具,后来又发展为女性纯粹的装饰审美饰品,商品性特征显著及审美趣味多样化,“髻髻”嬗变的背后映射了晚明社会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变迁。

**关键词:** 明末; 商品经济; 髻髻; 嬗变

**中图分类号:** TS941 **文献标志码:** A

自明中叶以后,传统“重农抑商”的生产模式面临挑战,人们生产的产品除了供自己生活所需外,有一部分转化成为商品,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向商品经济方向的转变。当时的江南地区手工制造业发达,作坊、商铺等到处林立。加之晚明海外贸易的繁荣,刺激着国内商品生产激增,商品经济的浪潮涌现,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方式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髻髻”一词元朝就已出现。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曲词中有:“梳了霜雪般的白髻髻。”<sup>[1]</sup>此时的“髻髻”不用假发,而是指发髻本身。到了明朝,“髻髻”不再是单纯的发髻,且包含罩在发髻外的包裹物,故也叫做“假髻”。其是以金银丝编成圆框,上蒙黑色缯帛;或以丝线、假发等编成髻状,使用时戴在头顶,上插若干簪钗首饰。

扬之水女士的《明代头面》与孙机的《明代的束发冠、髻髻与头面》书中,详细地介绍了髻髻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造型类别以及与头面的组合插戴关系。相对而言,单独对“髻髻”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少,且多集中在对其造型、审美等方面。本文以明末商品经济浪潮为研究背景,分析“髻髻”在等级性、商品性以

及审美趣味性三个方面的嬗变,并透过生产方式与“髻髻”嬗变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经济、思想、风尚习俗三个方面探究“髻髻”嬗变的成因。

### 一、“髻髻”等级标识弱化

明初以“儒家之礼”立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有儒家思想的伦理性特征,使得社会发展井然有序。起初,“髻髻”是统治阶级用来区别女性身份等级的标志饰物。《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三年定制,凡宫中供奉女乐、奉銮等官妻、本色髻髻。”这里的“本色”通常可以引申为髻髻上所裹织物的颜色,以质料来区别女性的社会身份。首先,规定髻髻是明代已婚妇女的正装,家居、外出或会见亲友时都可以戴,而像灶台丫头身份的女子,就没有戴髻髻的资格。其次,普通百姓只能戴头发髻髻,大户人家的妻妾可以佩戴银丝髻髻,只有官宦人家的正室妇人才能戴金丝髻髻。江苏无锡曹氏墓出土的银丝髻髻(图1)<sup>[2]</sup>,表明了她作为从九品夫人的身份。此外,品官命妇和内命妇均戴特髻,即形制规格更高级的髻髻,明成化时期的写实画像《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的嫔妃便是清一色头戴特髻(图2)。皇后着常服

收稿日期: 2015-06-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MZ049)

作者简介: 洪安娜(1988-),女,江苏无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服装史论与设计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张竞琼, E-mail: honganna66@126.com

时冠制亦如特髻,如定陵中万历的两位皇后,在入葬时都戴着这样的“黑纱尖棕帽”。

明朝晚期,由于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发生转变。社会普遍以财富来衡量地位高低,导致奢侈风气浓烈。此时的髻髻多用金银丝编制而成,以服饰来区分等级阶层的标志壁垒逐渐被打破,僭越现象司空见惯。嘉靖三十七年,浙江义乌吴鹤山之妻金氏墓出土的金丝髻髻,其上半部较圆钝,像一顶小圆帽(图3)。<sup>[3]</sup>金丝髻髻也叫“金冠”“金丝梁冠儿”,是髻髻中最昂贵的一种。



图1 江苏无锡曹氏墓出土的银丝髻髻



图2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图3 浙江金氏墓出土的金丝髻髻

## 二、“髻髻”生产的商品化

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末又兴起以金银丝编结髻髻的风尚,当时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品才算是够规格的髻髻。在京城及一些中小城镇,设有专门制作及销售这种假髻和簪钗的作坊和店铺。在杭州,有专门从事金箔、销金之业的工匠、商人。他们的产品除了上供之外,大多用于民间百姓的首饰、衣袴。

至明朝末年,北京卖衣服、面料、首饰的店铺,更是到处林立,如前门桥陈内官家首饰、双塔寺李家冠帽等都闻名一时,起家巨万。<sup>[4]</sup>可见当时从事“髻髻”生产制作买卖的商人无数。此外,富贵人家的小姐在出席盛大场合时,还有专门的“插戴婆”为其穿戴髻髻。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一“绣花娘·插带婆·瞎先生”条曰:“插带婆者,富贵大家妇女赴人筵席,金玉珠翠首饰甚多,自不能簪妆,则专雇此辈。颜色间杂,四面均匀。一首之大,几如合抱。即一插带,顷刻费银二三钱。”<sup>[5]</sup>头面簪钗的数量决定了插戴技艺的繁杂,使得晚明女性首饰装扮奢侈成风。由于“髻髻”生产的商品化以及对金银硬通货的刚性需求,带动了一系列的社会分工和货币流通。据史料记载,明朝隆庆至崇祯年间(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当时世界上约1/4的白银流入了中国,可以说当时的明朝是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髻髻”具有商品的特征属性后,就势必变得奢

据史料考证,吴鹤山并非官宦身份,其夫人亦不具备戴金丝髻髻的资格,但却敢于僭越,可见此时等级观念较弱。在《水浒传》中,西门庆家的上等奴婢,也开始模仿妻妾的服饰戴髻髻。其中女仆宋惠莲,就不满于戴头发髻髻,对西门庆说:“你许我编髻髻,怎的还不替我编?只教我成日戴这头发壳儿。”西门庆道:“不打紧,到明日将八两银子往银匠家,替你拔丝去。”说明丫鬟也可以戴原本属于妻妾的银丝髻髻了。到了崇祯末年,女性髻髻不再用象征身份的金银为饰,只用乌纱为质,任人随意自插珠翠。

华繁琐。得益于晚明海外商品贸易的发达,来自于东南亚各国的宝石和珍珠也在“髻髻”的商品化生产中被使用,与之搭配插戴的“头面”遂得以流行。当时的妇女一般不单独戴髻髻,围绕着它还要插上各种簪钗,形成以髻髻为主体的整套头饰。据范濂《云间据目抄》所载:“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圆扁,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两耳用宝嵌大钗。”<sup>[6]</sup>其他主要的髻髻头面还有“钿儿”“分心”“压鬓钗”等。金银首饰遂以“头面”为单位,与髻髻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插戴组合关系,每一款都有特定的造型、名称以及佩戴位置。如此形成的“一副头面”就是指插戴在髻髻周围且装饰题材一致的各式簪钗饰物(图4)。装饰题材的差异也反映出女性身份等级的差别,如定陵出土的“黑纱尖棕帽”上簪钗的首饰,孝端后的首饰题材多以“寿”“万寿”“佛”金饰为主,孝靖后则多以“莲花”“观音”“蝴蝶”玉饰为主。“髻髻”生产商品化的背后反映出社会政治秩序的变动,服饰礼制的溃散,以及奢华风气的愈加浓烈。

## 三、“髻髻”审美趣味的多样化

### (一)材质的丰富性

由于明代妇女服饰包裹较为严密,使得头部装饰变得重要,其头饰门类细化也比前朝历代都要繁琐,各类簪钗都有其名目用途,女性盛装的首服几乎



图4 明代容像中妇人插戴的髻髻头面

把满头插得不露发。得益于明末海内外繁荣的贸易市场,此时的髻髻多用金、银或鎏金制成,以宝石、玉、珍珠、玛瑙、琥珀等为材料制成首饰插戴在髻上,精致奢华。《金瓶梅词话》中就有诸如金丝髻髻、银丝髻髻、扭心髻髻与金丝绉纱冠儿等描述。另在《醒世姻缘传》中也载有金丝梁冠、五梁珠髻、尖头髻髻等各种材质的髻髻。金制的髻髻通常会做成冠的模样,上提到的“金丝梁冠、金丝绉纱冠儿……”便是这一类。冠一般呈扁矮的椭圆形状,而银丝髻髻的基本形状则是圆锥体。崇祯末年,“髻髻”只用乌纱为质,不用金银,珠翠随意插戴。此时的“髻髻”虽然材质品种多样,但其等级性标志意义消失,只为时尚审美服务。

## (二)形制的多样性

早期的“髻髻”像顶小圆帽,随后逐渐变尖变高。据明人董含撰《三冈识略》记载:“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发高三寸许,号为新样,后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牡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重至不可举首。”<sup>[7]</sup>弘治年间,妇女髻高寸余,到正德年间,发髻逐渐趋高,北京的女性发髻已高达五寸,首尖向后,以至当时有“妇人髻倒戴”之谣。嘉靖年间,发髻高如官帽,都用铁丝胎制成,高六七寸,口周长一尺二三寸多。<sup>[8]</sup>崇祯末年,女性髻髻又变得大而扁。万历时期,定陵出土的“黑纱尖棕帽”,其形制为:似截尖圆锥体,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制成后套合缝制在一起,在顶部及前后相接处均留有孔,在棕的外面缝有纱面。在棕帽的里外两面分别缝上两层细纱,里为红色,面为黑色。<sup>[9]</sup>可见,明中期以后,女性“髻髻”的形制造型逐渐变高,并以此为时尚流行。此外,还有尖头、扭心等造型多样的髻髻,如江苏南京栖霞山2

号墓出土的金丝扭心髻髻(图5)。“髻倒戴”是一种典型的“服妖”现象,以新奇为美的社会风尚也促使“髻髻”造型各异形制多样。



图5 江苏南京栖霞山2号墓出土的金丝扭心髻髻

## (三)精湛的制作工艺

晚明商业城市生活日趋繁华,社会流通速度加快,妇女不再安于困守闺房家门,足不出户,而是积极参与社会各项活动,扩大社会交往。妇女生活及其行为方式出现了许多新动向,思想萌动的外化体现出对髻髻的艺术性审美变化。由于手工匠人的高超制作技艺,此时的“髻髻”式样丰富,制作工艺精湛发达。其中有一种假髻形制独特,被单独做成了固定的装饰物,称为“鼓”。顾起元《客座赘语》也说:“今留都妇女之饰在首者,……以铁丝织为圈,外编以发,高视髻之半,罩于髻而以簪绂之,名曰鼓。”<sup>[10]</sup>其内胎主要是选用铁丝圈制作而成,再缠绕着假发,并直接将“鼓”罩在发髻上,再借助发簪之类的饰物将它与真发紧紧挽结在一起,就可以梳理出各种随心所欲的发式,从而更为省事和便捷。“髻髻”制作工艺的发达,促使其商品化步伐加快,材质丰富多样,形制造型各异,时尚审美趣味多变。

## 四、明末“髻髻”嬗变的成因

### (一)经济繁荣、商人阶层崛起

古代社会,商人位居四民之末,备受轻贱,统治者给商人规定的生活标准连农民都不如。据《明史·舆服志》记载:十四年令农衣绌、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绌、纱。明朝晚期,商人经商致富后,拥有了雄厚财力的支持,往往视礼制为无物,开始模仿上层社会的豪奢生活,尽情挥霍享受,妻妾成群,美食美衣,高堂大厦。因此,导致传统“士、农、工、商”的阶级地位发生了变化,不但农村出现了一股“弃农”之风,士大夫阶级也出现了“弃儒就贾”的现象。此外,由于匠役松弛,匠人有更多时间从事手工制品的开发,促使“髻髻”制

作工艺不断精细完善。工匠为了追求更多的社会财富,“髻髻”转化为商品出售,导致商人阶层崛起,如名噪一时的山西巨富、徽州大贾。对权力的迷恋使得大量富商通过“社会效仿”官员命妇的服饰,达到社会流动及纵向上升,从而打破既定的身份区隔,社会出现以“拥有财富多少”论身份高低的现象。加之南方繁华的贸易市场,满足了人们竞奢尚奇,僭名越分的风气,“髻髻”暗含的等级意识不断弱化。

## (二)思想发展、生活观念转变

明初的宋明理学,认为只要能遏制人的欲望,就能维护社会礼教的秩序。其实这有违真实人性,在根本上极难实现。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浪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礼教的冲击,传统的生活观念已开始面临挑战。“生活”的内容不再仅仅是耕织,而是扩大到了商业。大量的士人不再谈虚论道,而是更多关注国计民生,甚至是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使得社会生活更加世俗化、享乐化。加之,明中后期理学又加入了对道、佛学的探讨,即心性、宇宙、玄理的思想,使得人对“纯真”的欲望追求越来越强烈。这种“自由”的精神需求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矛盾不断激化,使得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盛行,晚明士大夫开始响应追求“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的真正“自由”精神<sup>[11]</sup>。晚明人开始了一个逐渐凸显自我的变化历程,社会思想观念也由以往的“劳作”向“享受”方面转变。晚明生活的享乐化,又可析为俗、雅两个层面。世俗百姓无非是赌博、喝酒,有佳人作伴,更多是物质的享受,如浙江桐乡县的青镇,俗崇尚奢侈,“夜必饮酒”。<sup>[12]</sup>士人则是追求游山玩水、弈棋弹琴、狎妓宴饮、书画古玩的清适生活。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正如明人焦竑所说,都是“狗物”,“丧己以逐物”<sup>[13]</sup>。这是明代生活内容趋于享乐化、世俗化的最大特点。女性“髻髻”从淡泊素雅到华靡秾丽的转变,与生活观念的改变息息相关。

## (三)风尚习俗的流变

明代妇女流行发式众多,头饰造型材质丰富多样,审美独特新颖,“世俗化”特征显著,成为妇女服饰演变过程中的新亮点。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时尚”。“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sup>[14]</sup>,即“新”与“奇”的风尚习俗。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繁华城市生活,给晚明的市井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染上了独特的色彩,即留恋享受世俗的繁华,纷纷由隐居转向城市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有不同程

度的“世俗化”特征,并且日益显著。各种“时世装”开始流行,厌常尚奇“服妖”现象丛生,用貂狐之皮做成“昭君帽”“抹额”“卧兔儿”等头饰开始流行,明末江南名妓的苏州妇女引领了明朝的“时尚”。其衣饰,包括头上发髻的高低,衣袂的宽狭修短,花钿的样式,服装印染的颜色,鬓发上的首饰,以及鞋袜的工巧,不到两三年就有了变化,淘汰旧样式,流行新样式。<sup>[15]</sup>可以说,明末的审美习俗是随风而变的。此时的审美由原先的自上而下主宰,变成了自下而上的自主性、个性化流行。

## 五、总 结

明代妇女首服“髻髻”嬗变的背后映射了晚明社会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变迁。首先,它表现出晚明“礼”制崩塌、僭越无度、奢侈成风的社会现象。其次,晚明“心学”思想的盛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以及审美时尚的流行,最终导致“髻髻”所蕴含的等级特征消失近无。此外,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崛起,也促使“髻髻”等级标识弱化,商品性特征显著及审美趣味多样化。

### 参考文献:

- [1] 孙 机. 中国古舆服丛论:增订本[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04.
- [2] 无锡博物馆. 江苏无锡华复诚夫妇墓发掘简报[G]//文物编辑委员会. 文物资料丛刊:2.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34.
- [3] 吴高彬. 浙江义乌明代金冠[J]. 收藏家,1997,(6):48-49.
- [4] 邓之诚. 骨董续记:卷4·明末京城市肆[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415.
- [5] 田艺蘅. 留青日札[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66.
- [6] 瞿宣颖. 中国社会史料丛抄甲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04.
- [7] 管 驿. 试论明清“时世装”与昆剧服饰的相互影响[J]. 丝绸,2005(10):47-49.
- [8] 顾炎武,黄汝成. 冠服[M]//日知录集释:28.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59.
- [9]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文物工作队. 定陵[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7.
- [10] 刘晓萍. 明代髻髻的类造与美趣[J]. 装饰,2013(7):76-77.
- [11] 陈宝良. 明代社会生活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1-42.
- [12] 李 乐. 续见闻杂记:卷11[M]. 上海:中华书局,1986:1021.

- [13] 焦 竑. 澹圆集:卷 22·庸言跋[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228.
- [14] 陈宝良. 明代的服饰时尚与审美心理的转变[J]. 艺术设计研究, 2012(1):41-45.
- [15] 闫 晶, 仇华美, 尹利琴. 中国明朝服饰文化探析[J]. 东华大学学报, 2007(1):45-48.

## “Jiuji” Evolution in Late Ming under Commodity Economy Tide

HONG An-na<sup>1</sup>, ZHANG Jing-qiong<sup>2</sup>

(Jiangsu Province Im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enter,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Married women must wear headgear “Jiuji” in Ming Dynasty. It is also the head ornament used to match the clothing.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Jiuji” owned “rite” significance of standardizing social identity. Till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prevalence of psychological ideology, secularization of social life and popularity of aesthetic fashion make “Jiuji” evolve to a tool to show richness from original “rite” symbol. Later, it developed to a pure decoration accessory. Its commodity feature is significant and aesthetic interest is diversified. “Jiuji” evolution maps the change of various aspects in social culture and life.

**Key words:** the late Ming Dynasty; commodity economy; Jiuji; evolution

(责任编辑: 王艳娟)